政治科學論叢／第四十九期／民國 100 年 9 月／頁 161～196

台灣婦運與世代價值差異

楊婉瑩*

摘　要

本研究關切一般公民的性別意識和婦運發展的關連性。婦運在不同時期對不同性別議題的社會倡議，可能擴散或動員了一般公民的性別意識的改變。本文認爲伴隨著台灣婦運的發展，同時產生世代性的集體價值變化，可以區分爲兩個主要的階段：其一是自一九七〇改革年代中，經歷社會經濟結構以及文化政治改變，首次出現對於既有性別秩序的挑戰，延續到之後的婦運組織化以及推動政策立法與社會結構改革，本文以該運動的時間起點劃分出所謂「婦運七〇世代」，指涉受到當時集體氛圍影響而型塑其價值的婦運世代。其二則是在一九九〇年代，在民主化後的台灣經歷社會多元化轉型，婦運議題進入大學校園的課程以及社團，年輕世代的成員的加入，繼受相對較爲平等的性別體制，轉向關切身體政治、認同以及差異政治，本文將之稱爲「婦運九〇世代」，代表受到該時期婦女運動價值影響的年輕世代。爲檢證不同婦運經驗所蘊含的集體世代價值差異，本文進而引用世界價值變遷資料庫（World Value Surveys）二〇〇六年台灣資料，來檢驗成長於不同婦運世代者在相關性別議題上的態度差異。資料結果顯示，「婦運七〇世代」與婦運前世代在性別平權價值上存在明顯的差異，「婦運七〇世代」強調性別平權相關價值，包括在政治、教育、企業等面向的男女平權議題。而隨著社會多元化發展以及世代成員的更替，「婦運九〇世代」對於性解放相關的議題與「婦運七〇世代」已經有所差異，兩個婦運新舊世代的差異主要顯示在同性戀以及性交易的支持態度上，也反映了當時婦運的立場爭議。這些發展都顯示出，世代是理解台灣婦運價值變遷的重要集體性的時間座標。

關鍵詞：婦運、世代、婦運七〇世代、婦運九〇世代、價值差異

---

*政治大學政治學系教授，E-mail: wyyang@nccu.edu.tw。
收稿日期：99 年 11 月 1 日；通過日期：100 年 8 月 23 日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壹、前言

婦女運動與民眾的性別意識之間，至少存在著兩種可能的關係。一方面，婦女運動的進程可能走在一般民眾性別意識改變之前，透過法律體制的修改，帶動社會對既有性別關係的重新思考與反省，同時改造社會既存的性別文化與公民的性別價值。另一方面，婦運在不同時期所提出的不同訴求，並非是憑空創造，而是反映了特定社會情境下，集體的性別關係困境，婦運的議題乃是起源於群眾的需要，進而不斷地進行社會倡議、社會論述與溝通，婦女運動不只是所謂少數人的婦運，而是生產於民眾經驗的運動。不論何種關係，婦運的發展和一般民眾的性別關係與意識的發展，可以說是密切相關。

一般群眾的性別意識，是否伴隨著婦運的推動而同時出現改變，這個問題又可以分爲兩個層面：首先，性別議題相當多元，台灣婦運在不同時期所推動的不同議題，可能使得民眾的性別意識的發展有階段性與議題差異性。台灣婦女運動推動的議題，初期主要是性別平權相關議題，包含了兩性在教育、工作、參政、家庭生育以及社會福利保障等各層面的權利訴求。即使近年來女性在教育與就業機會逐漸提升，但台灣仍普遍存在女性勞差率偏低，職場性別隔離、性別化的家務勞動、教育的資源分配不公以及性別歧視的挑戰（張晉芬，1995；謝小芩，1995），男女在參政上的性別比例也有相當落差，這些平等議題仍持續在婦運的議程中。此外，自一九九〇年代以來，隨著社會結構變遷，婦運所推動的價值以及性別議題也更趨多元，個體認同與差異議題逐漸浮出檯面，包括了性取向與身體自主相關議題，例如性自主與色情、性交易、同志、或是科技與身體的關係如代理孕母等，這些也成爲婦運關注的課題。不同時期出現的性別議題，有的涉及分配性正義（如就業與福利），有的涉及對身體與性的剝削與自主（如性交易），各種議題涉及不同的價值與爭議，也使得民眾對於不同性別議題產生不同態度。

其次，不同性別議題，往往會吸引某些公民的支持或招致特定民眾的反對，而決定個人是否支持特定性別議題或價值，則不免受到個體或是集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體經驗的影響。民眾的性別意識乃是非均質的分配，而個人是否具備性別意識或是支持婦運議題，和個人的特質、經驗與處境都有重要關聯。過去相關研究顯示，個人的經驗與特質，包括性別、教育、婚姻、就業以及宗教信仰等，都會影響其支持女性主義運動的態度(Andersen and Cook, 1985；Klein, 1987；Wilcox, 1991；Banaszak and Plutzer, 1993）。一般而言，各國婦運的支持者或是支持性別平權價值者，多爲年紀較輕、教育程度較高、女性有就業者。然而，Schnittker et al. (2003) 研究民眾對婦運認同則是發現，許多個人情境與社會結構特徵（包括性別、婚姻、孩童、就業、教育、種族）與個人女性主義認同之間並無顯著關連，世代才是主要解釋女性主義認同的主要因素，也就是性別價值的變化有著時間上的集體性，看似個體間態度的差異，其實是集體世代間的性別價值差異。

對台灣婦運的研究，范雲（2003）也發現在一九七〇年代婦運首次出現之後，經歷一九八〇年代的婦運組織化與擴大化，在一九九〇年代婦運議題漸趨多元化；其中，不同世代的婦運工作者，其生命情境與認同軌跡的差異，使得婦運界在爭議性（公娼／性交易）議題上產生認同的分歧。該研究由運動者的生命傳記，觀察到婦運世代的差異，進而推論婦運參與者或是工作人員的世代差異，對於運動組織戲碼與策略等的影響，此爲該文重要的貢獻。文中提及外在環境的改變對於婦運世代的影響，然該文尚未討論到一般民眾是否隨著身處婦運世代的差異，也會產生集體性的世代性別價值差異。婦運內部的世代價值轉變，是否具有普遍性的民眾基礎，或是擴散到同世代的民眾，是值得進一步探究的課題。

世代是解釋性別價值變遷的重要切點，然而世代與女性主義認同之間的關係相當複雜。世代差異影響了性別態度的支持與否，世代往往是以年齡來呈現，然而年齡攜帶了多重的意義。年齡層的差異同時包含了政治世代或是生命週期的效果。不同年齡層可能代表成長於不同的婦運世代，處於同一世代者，由於在性別態度與基本價值的形塑與社會化過程中，經歷相似的社會事件或社會變遷，因此往往容易發展出相似的態度與價值。另一方面，不同年齡層也可能代表的是生命週期的差異，在個人經歷就業、單身或結婚、生育養育、離婚乃至於退休，在人生的不同階段面對不同的人生課題，或是不同社會位置對個人的態度都可能產生影響。過去研究年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齡世代和性別態度的關係，有的認爲在婦運發展時期成長的世代，受到婦運的洗禮，越容易接受或認同婦運的理念；但也有的認爲，受到具體生命經驗的限制或影響，年輕世代可能有保守化的傾向。世代與生命週期對於個人對性別價值的態度影響，需要進一步釐清。

在台灣，累積過去多年婦女運動的努力與成果後，可以預期的是，公民的性別價值觀念也會產生改變。民眾的性別價值的發展和婦女運動的進程相互扣連，在歐美經歷三波婦運後，發展出不同的性別世代與性別價值；而在台灣，民眾的性別意識的出現甚麼樣的改變，婦運世代和非婦運世代的價值區隔爲何？不同婦運世代的價值取向是否有所不同？這些都是本研究試圖回答的問題，本研究利用世界價值變遷資料（World Value Surveys）二〇〇六年台灣資料來討論這些問題，並依對不同性別價值的態度差異，來理解台灣不同婦運世代的價值取向與面貌。

貳、世代對性別價值的影響

性別平權意識的轉變，是否存在世代差異？世代的討論主要源自於一九二〇年代曼海姆（Mannheim, 1952）的政治世代以及世代交替（cohort replacement）理論。他定義世代爲每個出生科夥（birth cohort）成員在所處的共同社會文化中，分享了特定的社會世代位置（generational location），分享了共同經驗後成爲實存世代（actual generation）。再者，某個實存世代的成員，共同創造（work up）其獨特的意識形態或態度經驗，可以被視爲一個世代單位（generation unit）。這樣的世代單位乃是相當狹義的定義，指涉特定的具有集體意識的少數人。世代研究在一九六〇年代社會運動蓬勃發展的時期，經常用來定義學運世代的概念。相關研究也指出世代對於個人價值（如後物質主義)、政黨認同、政治保守主義以及其他政治態度影響相當重要（Abramson, 1983；Braungart, 1984；Campbell, 1971）。人們傾向持續攜帶其年輕時期所發展的認知詮釋原則（interpretive principles）到其年長的階段，個人過去的重要歷史經歷不會隨著年長而改變其歷史效果。亦即同屬一個世代者在政治認知信念乃至於行動上有其一致性與穩定性。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相對於世代觀點認爲，同一世代的共同經歷會塑造出集體經驗與價值的相似性，生命週期的觀點則傾向認爲，即使經歷相同歷史事件，但具體生命處境的差異，也會使得世代成員產生不同的態度。個人不同生命階段（接受教育、組成家庭、退休等）的社會狀態、心理與情緒發展、從事的活動、以及需要等，將影響個人認知以及對政治世界的觀感。個人在青春期晚期以及成年期之前的階段，乃是個人政治態度行爲發展的關鍵，剛開始與社會產生接觸，受到個人所處社會位置以及面臨的議題的影響，往往對於年長世代的政治遺緒產生懷疑甚至進入疏離或反叛時期。年輕成人會逐漸形成其對工作與社群的承諾，進入中年則鞏固這些決定，同時擴展其權力與社會網路，隨著年齡增長，個人的活動力減弱，也由過去年輕時期的未來取向的思考轉向有限人生的思維，也就是一般所謂的中年危機的出現，同時成爲傳統價值的保存者（conservers of tradition），較不關注改變，而希望保有現狀。同時，因爲在社會有較多的投資（developmental stake），相對不會疏離於政治，反而更投入主流政治參與與投票（Milbrath and Goel, 1977；Braungart and Braungart, 1984）。[1]

不論是社會世代或是生命週期，都牽涉特定的性別意義。然而，傳統世代的討論自曼海姆（Mannheimian, 1952）以來，預設了性別中立或缺乏性別觀點，忽略女性經驗的獨特性的結果，反映了男性的傳統世代觀，傳統政治世代的討論也受到性別研究者的批判與修正（Schneider, 1988）。男女在同一世代往往具有不同經驗，以及對相同事件的詮釋乃是不同的；這些討論使得研究者在採用世代觀點時，除了著墨於政治環境的變化以及年齡的變數外，必須更加謹慎處理婦運對世代的影響以及性別關係的改變。不同世代受到其經歷的歷史事件的影響，發展出不同觀看世界的方式，而婦女運動的發展也影響了不同世代的性別視野、性別平權意識與性別關係。因而解釋性別意識的世代差異，自然不能忽略其所受到的時代影響，特別是該時代婦女運動的發展對於世代價值變化的影響。

---

[1] 所謂主流政治一般指的是投票參與，投票研究顯示投票率最高的是中年人，其次是老人，最少的則是年輕人（Campbell, 1971；Verba and Nie, 1972）。隨著年紀增長，個人越趨保守，或是即使個人並未改變，但是社會變化太大，也很容易使個人變得相對保守。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個人對性別角色與平權的態度受到所屬的時代氛圍影響，其中婦女運動乃是最關鍵的發展。一般歐美學者對於婦女運動的進程，傳統上依婦女運動組織的發展以及訴求內容分爲兩波，第一波主要發展於十八、十九世紀，強調教育、工作、財產、參政的平等，最具體的代表莫過於婦女投票權運動；第二波則是發展於一九六〇、七〇，在歐美的新社會運動中，包括了美國黑人民權、反戰、新左派等社會運動，以及法國一九六八年五月風暴提出自主性的訴求，其中婦運則以喚醒性別意識自覺、提出不平等乃是政治問題，個人的即政治的策略主張，來對抗父權體制。在此波運動中，性自主權、反性侵害、暴力騷擾等私領域議題隨之成爲重要課題（Lovenduski, 1986；Randall, 1987；Pearsall, 1999）。晚近，不少學者也提出第三波婦運的概念，主要是發展於一九八〇年代晚期，對於女性本質化的反省或批判，轉而強調女性內在因階級、族群種族、或國別等多重身份／認同所存在的差異，多元文化與認同差異也因此成爲第三波婦女運動的核心。

依據美國女性主義運動的發展與世代之間的關係，在操作上，相關研究區分出三個不同的性別世代：成長於第二波婦女運動復甦的一九六〇年代中葉以前的世代；成長於第二波婦運發展的一九六〇年代中葉以及一九七〇年代早期的世代；以及第二波婦運之後的世代（Armstrong, 2002；Farganis, 1994；Ferree and Hess, 2000；Schnittker et al., 2003）。一般認爲，經歷婦運發展時期的個人，受到新社會運動的洗禮，不論在性別意識上或是政治行動上，都較可能採取進步積極的立場。而第二波婦運之後的年輕世代，受惠於婦運的成果，不僅較先前的世代更能接受婦運的主張，也能接受婦運的標籤認同（Misciagno, 1997: 69）。

不過世代與婦運之間關係並非直線性的。抱持著非線性婦運世代觀者主要又可以分爲幾種：一是所謂年輕女性的問題。Ferree and Hess (2000: 178-181) 指出世代與婦運的發展並非線性的關係，可能受到短期政治風潮或是個人生命轉折的影響。在短期政治風潮的影響上，一九八〇年代在歐美婦女運動面對新保守主義反挫下，有所謂女性主義的死亡（the death of feminism）；也有所謂後女性主義世代（postfeminist generation）的出現，這些新世代的特色是，對於女性主義所承諾的理想人生（生涯婚姻孩童）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的幻滅、以及不滿女性主義者所代表非女性化等，年輕世代甚至較年長世代更不容易認同女性主義以及其所代表的價值。由於承接許多既有的婦運果實，同時面對大環境的反挫，年輕世代並不一定認同於婦運的主張，女性主義者的認同反將隨世代更替而下降。Ginsburg (1989) 個案研究顯示，40 歲左右的中年婦女因爲曾經歷過婦女運動，比年輕女性更容易投身生育自主權（pro-choice）的運動。Schnittker et al. (2003) 的量化研究顯示，控制所有的相關社會結構變項後，成長期經歷第二波婦運者相對於較年長或較年輕的世代，比較容易自我認同爲女性主義者；年輕世代對婦運的自我認同降低，或許正反映出女性主義的內涵日漸多元的結果，年輕世代對於何謂女性主義者的認知，已不如第二波婦運初期成長的女性般有較爲一致且清楚的認知。

二則是所謂老年女性的激進化觀點。Steinem (1983: 212) 認爲年輕女性的保守主義與年長女性的激進化，乃是生命週期的必然。不同於傳統社會運動的男性觀點強調個人越年長政治立場越趨保守，女性將隨著年長年老而日漸激進化；年輕的女性在現實中掙扎比較容易接受男性的標準與價值的影響；女性經歷婚姻母職就業離婚年長等歷程，都使得女性更加激進化轉爲女性主義者（grow more radical with age）。生命週期的發展對於個人性別意識有著重要的影響，女性的生命週期特別受到女性私領域生活處境的影響，進入婚姻、養兒育女、是否就業或繼續就業，這些對女性而言乃是環環相扣的問題，對於男性則是可以切割的問題，私領域經驗明顯地影響了女性的生命週期的面貌，也影響其世界觀點以及對婦運的態度。女性主義認同乃是女性經歷母職與工作、就業職場歧視等不同生命階段共享的性別困境的產物。因此，年輕世代不必然帶領反抗，這是男性世代的觀點；相反地，年長的女性更可能帶領年輕女性進行反抗。女性對於女性主義觀點的認同，不一定是來自於集體運動所帶來的抽象價值，而更可能是植基於親身經歷以及個人利益，這樣的觀點將性別的差異由世代轉向生命週期的解釋。

相對於上述對年輕與年長世代的兩極看法，Rossi (1982) 則指出女性主義的進程乃是一種重複性地、兩階段的多世代的過程：第一世代努力推動結構的改變已突破本身所受的限制；第二代則接收第一代努力的果實，擁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有較多的自由、機會與進展；第三代視這些成就爲理所當然，因此更不能忍受所受到的限制，成爲發動新改革的第一代。Rossi 的觀點指出世代之間的連續性，運動不會隨著世代而完全結束或死亡，世代間的接觸影響了世代的價值與觀點，可以說是結合了世代與生命週期的觀點。

Ferree and Hess (1985) 研究也指出，年輕世代與年長世代的女性，在面對的問題、對生活的期待、以及生活的環境等都已有所不同，因此年輕世代面對過去年長世代的女性主義可能有幾種立場:一種是受到母親輩的角色模範以及女性主義世界觀的影響；另一種則是與女性主義運動疏離產生斷裂，活動於校園以及草根社區的環境，將年長女性主義的訴求視爲不重要的；再者，每一個後繼的世代都會加入其獨有的特徵以及新的想法，形塑持續變遷中的運動。也就是，價值的轉變既會隨著代間接觸而延續，也會隨著世代更替而更新其內涵（如產生第三波的婦運）。

對於個人的性別意識以及對婦運價值的認同，顯然地，婦運世代與生命週期提供了各自不同的解釋。個人可能因爲經歷婦運的集體洗禮，在婦運發展的時期成長者或是之後的年輕世代，越傾向認同婦運價值；也有可能如同 Steinem (1983) 所言，在生命週期的歷程中，年長者越可能經歷現實生活中的不平等關係與性別困境，反而更爲強調婦運的價值；也有可能的是，婦運的發展與性別意識之間，存在一種受到世代經驗以及生命週期共同影響的非線性的關係，所屬時代的共同客觀經驗塑造集體的主觀認同，而個人具體生命情境的變化又會與這些價值產生不同的連結呼應；再者，在不同時期，隨著社會結構變遷而發展出不同的性別議題與價值，同時新的世代成員的替換，使得婦運與世代之間的關係更趨複雜，而這些討論都必須在具體的社會脈絡下來探討。

參、台灣的婦運發展與性別價值

過去探討台灣世代差異的社會政治學者，所採途徑雖有不同，但多著墨於不同世代所經歷的集體社會政治環境變遷的影響，所產生其對政治特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質、態度以及行動的影響，[2] 較少觸及世代與歷史認同或社會價值的討論。蕭阿勤（2005）的研究以歷史敘事的角度，處理台灣戰後世代的轉變。蕭援引曼海姆的世代單位概念，檢視不同世代所共同經歷的歷史事件對於集體認同的影響。相對於一九六〇年代在威權體制下所出現的戰後「沉默消極」世代，他將焦點放在「回歸政治現實」的一九七〇世代，此一世代共同經歷了釣魚台事件以及退出聯合國的歷史劇變，在這樣的客觀環境變化中，當時 20 歲到 40 歲受過或是正在接受大學教育的知識青年開始覺悟回歸現實，從權力脈絡結構重新理解個人與社會國家關係，並企圖改變當時的政治社會文化體制，積極參與公共事務推動改變。相對於歐美的一九六〇反抗權威的新社會運動世代，台灣則是晚了近十年的一九七〇世代，該世代的認同乃是鑲嵌在國族歷史敘事的結構中，積極尋找自我與歷史定位，並從所處集體歷史位置的消極自在世代，到發展出改革積極的自爲能動性，這樣的集體身份/認同成爲改變歷史的關鍵世代。

一九七〇年代累積了戰後經濟成長的果實，個人所得增加，教育普及，西方自由民主思潮引進；但許多的政治社會危機也同時開始曝露，外交困境、統治者合法性危機、勞資糾紛、城鄉差距貧富不均等。在危機與轉機的交會的年代裡，當時的社會改革實踐是廣及政治、社會與文化各層面的，年輕世代透過出版座談等公開活動，挑戰威權體制的合理性，主張自由民主的政治改革，具有社會批判的鄉土文學的文化運動等。與此同時，台灣對傳統父權體制批判的婦女運動也首次出現，在這之前，台灣社會仍是處於威權體制以及父權體制雙重壓迫性結構之下，台灣幾乎沒有任何婦運或爭取女性權益的論述出現。一九七一年呂秀蓮的「新女性運動」普遍被視

2 國內關於政治世代的討論，主要以政治環境變遷爲主，最早的代表如劉義周（1993；1994：55），將政治世代區分爲 1949 以前完成小學教育者（出生年爲 1937）、1966 以後（出生年爲 1952）。區分重點在於 1949 年政府遷台，以及 1965 年經濟上不再依賴美援。其他以政治世代作爲主要分析解釋者則如陳陸輝（2000：115），他著重於國民黨威權體制的影響，而將世代區分爲出生於 1943 年以前，1943～1960 年出生者，以及 1961 年以後出生的三代。第一代選民出生在 1943 年以前的受訪者大多接受國民黨的國小教育。第二代選民目睹了我國退出聯合國以及中美斷交等重大外交挫敗。第三代選民則在其青壯年時期，經歷了民進黨、新黨與建國黨的成立，以及言論自由開放的民主轉型時期。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爲台灣婦女運動的起點，呂公開撰文批判台灣社會男尊女卑的父權結構，成立拓荒者出版社以及各種活動的舉辦，挑戰當時台灣的父權社會結構，後來呂參與政治改革活動因美麗島事件被捕後，婦女運動一度因而中斷，可見台灣婦女運動在一開始便是鑲嵌在七〇年代的社會改革與民主運動之中。

范雲（2003）將台灣婦女運動分爲四波，第一波以一九七〇年代呂秀蓮的初試啼聲爲代表；第二波則是運動團體的組織出現，以婦女新知雜誌社爲代表；第三波則是解嚴後多元婦女團體的出現；第四波則是婦運的差異與異質化階段。此種區分方式，確實能反映台灣婦運的出現以及組織型態的轉變；但就議題的發展區分來看，從第一波到第三波在組織形態與議題上，雖有不同但也有不少相似性，且第二波與第三波的發展時間極爲相近，若就社會變遷與世代的價值轉換來觀察，前三波似乎並未出現重要的轉折，或可視爲具有共同理念價值的同一波運動的延續。依照時間的發展先後來看，若以一九七〇年代呂秀蓮推動新女性運動做爲台灣婦運第一波婦運的起點，在這一波的發展中：一九七二至一九八一年間女性主義思潮開始出現於翻譯與相關著作中，一九八二年婦女新知出版社的成立，台灣婦運開始組織化，一九八七年解嚴之後相關婦女團體陸續成立（張晉芬、林芳玫，1999）。此期間，婦運團體引介西方女性主義的思潮，喚醒社會性別平等意識的同時，並具體地推動一系列相關性別法案，促進性別平權的落實，透過體制內與體制外的行動促進政治氣候的改變（梁雙蓮、顧燕翎，1995）。除了在民間推動性別議題之外，婦運更朝向體制的改造，並將性別平權視爲國家政策與治理責任等方向推動。

這一波婦女運動共同追求的是性別正義與婦女權益保障，在改造法制與國家體制上，有不少累積性的成果，也逐漸鬆動傳統的男尊女卑的性別權力結構。自一九九〇年代起逐步通過性別相關法案，包括民法親屬編修訂、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治條例（1995）、性侵害犯罪防治法（1997）、家庭暴力防治法（1998）、性別工作平等法（2002）、性別平等教育法（2004）、性騷擾防治法（2005）等，可以看到台灣在性別法律規範層面有相當的斬獲。此外，婦女權益也不僅止於法律的保障，在體制改革上也有所進展。一九九七年行政院成立「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簡稱婦權會），首次在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政府架構下有推動婦女權益的任務編制，二〇〇五年三月更在行政院婦權會大會通過逐步推動一連串的「性別主流化」工作，在行政院 38 部會及其附屬單位下全面推動，使性別平等成爲政府在組織編制、政策規劃、實施與評估的重要價值。[3] 婦女團體或相關學者專家，進入政府體制內影響政府政策的制定到執行與評估已有初步成效，但也面對不少性別議題進入國家體制後的性別治理問題。[4] 婦運和國家體制的關係，隨著國家女性主義的發展受到檢驗，仍在持續磨合修正之中。整體而言，自一九七〇年代起的婦運發展，就改革性別權力關係在結構與體制上，有其延續性與累積性的成果。

除了持續的進展之外，另一方面，一九九〇年代是台灣社會在民主化後，社會漸趨自由化以及多元化的轉型期。女性的教育程度以及就業率也都有普遍的提升，自一九八〇年代末期許多婦女團體紛紛成立後，婦運的發展路線以及議題也越趨多元。一九九〇年代，婦女團體除了持續對政府的政策、組織、資源分配施壓改革之外，並陸續在北市以外縣市成立組織並開始進入社區基層扎根，同時婦運也擴展到校園，性別社團與性別研究室陸續成立、相關性別課程也紛紛開設，年輕的校園婦運新世代逐漸出現，爲婦運注入新血。新世代成長於台灣社會經濟政治各層面高度發展的時期，對於民主平等等價值與體制視爲理所當然，在性別運動上，也逐漸轉進新的議題與價值。除了自早期婦運一直推動的各領域的平等以及反歧視議題之外，反性騷擾與性暴力、墮胎合法化所觸及的身體與性的問題，也在九〇年代帶動新興的性與性別議題，如同志性少數、性解放、以及性交易與身體自主等的出現，這些與認同與差異高度相關的課題，也開始在這時期成爲討論的焦點，甚至成爲區分不同婦運陣營的議題。

不同婦運世代對性別議題的不同關切，主要出現在九〇年代，婦運內

---

3 2008 年 6 月，386 個委員會中，任一性別比例達 1/3 的委員會已達 344 個（89.12%）。2006～07 年開始在 37 部會署下陸續設置性別平等專案小組，由部會首長或副首長擔任召集人，並聘請民間相關性別專家或團體參與。

4 這些問題包括:政府政治承諾不定以及公務體系共識不足、官僚本位及技術官僚化、缺乏課責、政府官員和婦運人士之間對於性別平等觀念仍存在落差、以及性別官僚在父權框架下的性別想像等（黃淑玲，2008；彭渰雯，200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部開始出現「性批判」（反對性騷擾色情等）相對於「性解放」的不同訴求，以及台北市主張「廢公娼」相對於主張「性工作權」的婦運立場差異的激烈化。九〇年代婦運路線差異被許多不同的對立方式討論：包括顧燕翎（1997）稱兩種對立爲「性別政治 vs. 性慾政治」之爭，[5] 前者（性別政治）指的是早期婦運關切女性在公私領域的弱勢位置，積極爭取其工作、教育、財產參政等權利；後者（性慾政治）則關注女性的身體自主性而產生分歧，性慾政治中又可分兩種，一是將女性視爲去性慾化的受害者，推動墮胎合法化、救援雛妓、反色情等議題；另一派則是將女性視爲情慾主體，並開始重視女同性戀、情慾自主、性解放等議題。林芳玫（1998：69）將兩者的差異稱之爲「性批判／大眾／體制內改革」vs.「性解放／分眾／邊緣戰鬥」之爭，前者在議題上採取性批判立場、運動路線著重托育照顧、社區、人身安全、就業福利等大眾政策利益，婦運的政治位置轉進體制內改革（行政部門、議會與社區）；後者在議題上採取性解放立場，運動路線強調差異政治的族群階級、同志性傾向、性慾等多元主體與認同，運動的政治路線爲體制外的邊緣戰鬥（文化符碼意識型態）。而兩者最大的差異，顯示在對於政治的不同理解與回應方式。[6]

和歐美第三波婦運的發展相似但步調不一地，九〇年代的台灣婦運也

5　顧燕翎指出在婦運發展至一定階段後，必然會面對性慾政治的挑戰，女性如何看待自己的身體，既要免於壓迫宰制，又要開發身體的主體能動性兩者之間的矛盾。90 年代正是台灣面對性慾政治的關鍵年代，性與身體議題逐漸受到關注，如 1989～1990（婦女救援會）反色情訴求達到高潮，1991 年清華大學出現衛生棉論戰。1994 年在師大性侵害事件後，婦團的性騷擾的大遊行中，何春蕤喊出「我要性解放不要性騷擾」的口號，以及隨後的媒體放大效應，兩種訴求（反性騷擾 vs. 性解放）的差異隨之浮現。其後，1995 臺大女生看 A 片的事件，再次使性享受與性批判兩種立場對立化。而 1997 年台北市廢公娼的爭議，則是更進一步把積累的性別政治與性慾政治的內在矛盾集大成並對峙化（顧燕翎，1997）。

6　卡維波將顧燕翎、林芳玫與劉毓秀等人的主張，相對於何春蕤在議題與立場的差異合稱之爲「婦權派 vs. 性權派」之爭。卡維波特別強調 1990 年代的兩次運動中人事分裂事件，所顯示的路線之爭，一是 1994 年反對性騷擾性侵害的遊行中，何春蕤喊出「要性解放不要性騷擾」的口號，隨後何退出女學會並於 1995 年成立性／別研究室；另一次則是在 1997 年因廢娼與反廢娼爭議而出現的新知家變。卡維波認爲兩次爭議顯示婦權派接受性慾政治中的情慾自主，但未接受性解放主張（卡維波，200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進入認同與差異政治的討論。范雲（2003）將台灣 90 年代所出現的婦運內部差異視爲「分配政治 vs.認同政治」之別，前者爲社區及福利運動者，對於照顧以及托育社會福利等分配正義的追求，相對於後者爲年輕的女性主義者和女大學生，對身體政治與性解放的訴求，顯示出婦運參與者的世代經驗差異。彭渰雯（2006）則將兩種路線之別稱之爲「主體 vs. 結構」優先順序之差異，前者指稱強調女性主體能動性而忽略既有歧視結構的運動路線，後者則是關切結構面性別歧視優於個人能動性的婦運。[7]

這些不同路線的區分，包含了議題重點與優先順位、婦運策略、乃至於核心立場的差異，顯示婦運已經在議題上發展出世代差異。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婦運路線之爭，主要是發生在九〇年代，而參與其中者也有著不同的生命經驗與背景，時間與世代在婦運議題與立場上，有著重要的關聯。在范雲（2003）的研究中特別指出，在對性解放與公娼爭議中，並無法用組織、政黨等加以區別支持與反對者，僅能用世代加以區分，立場的差異反映著不同婦運世代的生命經驗，在其調查的婦運工作者中，年輕世代者（該研究中指 35 歲以下），多數爲大學性別社團的新生代婦運者，有近七成支持以及三成反對公娼；年長世代的婦運者（35 歲以上），長期從事體制結構與政策的改造的婦運工作者，則有七成反對以及三成贊成公娼。年長一代關切家庭和與男性的關係、工作、福利等政策議題；年輕世代在校園開始接觸同志以及性解放的思潮，並追求個人性政治認同的過程，這樣不同的個人生命經驗匯聚所產生的集體性世代差異，才是婦運路線策略差異的根源，更顯示世代在理解台灣性別議題與性別意識發展的重要性。

回顧台灣婦運的發展，自七〇年代以來的性別體制改革運動議程仍持續發展中，但九〇年代也轉化出新的主體認同議程，這兩個關鍵的時期，一個是在婦運初始階段的七〇年代，另一個則是在婦運議題轉向分歧的九〇年代，這兩個年代中，都是台灣婦運議題討論最爲熱烈，社會動員最密集的過程。而究竟在台灣婦運發展的經驗中，逐漸出現的多元分歧性議題，

[7] 此外，婦運對於資本主義的市場消費的批判或是利用、科技與身體自主、有無政黨立場、以及不同國家認同等，也存在不同的看法。婦運路線之爭的是非，並非本文重點，此處僅是指出婦運的發展，隨著 90 年代開展出多元化議題與角度觀點，與世代成員的更替之間的關係。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與世代之間的關係爲何，不同世代是否在不同的性別議題上，發展出不同的價值？

肆、世代對性別價值的影響分析

隨著台灣婦運的異質化發展，不同婦運世代對性別議題的支持是否存在世代差異？這個問題可以進一步區分爲兩個部份：首先，世代差異往往顯示在對於不同議題的關注或態度差異上。世代共同的歷史經驗對個人的認同有其形塑效果，隸屬於同一世代者，對於某些特定議題擁有相似而穩定的態度傾向，隸屬於其他世代者，其共同點也顯示在其對另一組議題所擁有的相似態度（Tessler et al., 2004: 188）。不同世代間的差異往往顯示在所關注議題以及態度的差異，議題對於婦運世代具有其關鍵性的區辨力。由於性別議題相當多元，要探討不同世代在性別價值的態度差異，本文將先行找出和世代相關的不同性別議題與價值，並將之進行分類。再者，要探討不同世代間對於性別價值態度的差異，需先行界定台灣的婦運世代，進而檢視不同的婦運世代對於性別議題是否有不同的關注或是立場。此外，世代集體經驗雖然有著重要影響，但是個人在不同生命週期所面對的具體生命情境，同樣也影響個人的性別態度與價值，分析上也需要釐清世代與生命週期的不同影響。以下的分析，將首先針對和世代相關的性別議題或價值加以歸類，再進而界定台灣不同的婦運世代，以及透過資料分析來觀察不同婦運世代是否具有不同議題價值取向。本文將以世界價值變遷資料庫（World Value Surveys）中二〇〇六年台灣資料，針對性別相關問題，來進行分析與討論。該筆資料中台灣部份的資料，乃是由杜素豪主持，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執行的價值變遷研究。

一、婦運議題的多樣性

社會大眾對女性主義的價值的支持與否，並非以同樣的步調、同樣的方式發展，在不同國家在不同的議題上，經常有不同的時程進展。一般而言，歐美幾波婦運種常見的分類方式是:第一波婦運爲溫和派追求婦女權益（women's rights），強調各個不同政治社會經濟層面的平等權；第二波婦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運則爲追求婦女解放（women's liberation），強調性認同以及身體自主；第三波婦運則反思認同與差異（identity and difference），關注各種因種族國族階級等多元的差異。綜觀三波婦運美歐社會存在許多相似的關懷，如家庭角色的演變、墮胎、婦女就業與福利等議題，同樣存在女性主義－傳統女性角色的政治分歧，但因文化差異而在不同性別議題上有不同的進展。[8]

因此，在研究婦運的發展時，必須檢視其發展的具體脈絡，以及在議題上的不同時期的優先順序。同樣地，在台灣的婦運議題也存在多樣性，包含社會政治經濟的平等、私領域分工、身體自主權（生育與代孕）、性取向、性解放、性交易等多元差異等不同價值，這些議題和國際婦女運動關切的議題有其重疊性，但也有其在地發展的差異與時程之別。要了解這些不同性別議題在台灣的發展情況，本研究選擇世界價值變遷（WVSs）二〇〇六年問卷組中與性別價值相關的問題，共有下列 11 題，並初步依照年齡層區分在這些相關價值上的變化如表 1。

在下述 11 題與性別相關的題組中，包含了工作教育政治的平等、性與身體生殖、以及家庭型態等多樣的問題，涵蓋了婦運的核心議題。其中，從資料可以初步發現，台灣的性別價值隨著年齡層而有所不同，各題的卡方檢定或是 ANOVA 檢定皆呈現顯著差異。在最年長與最年輕的年齡層之間，確實存在相當大的價值差異，特別是在 v59 關於單親媽媽、v63 關於企業主管的兩性平等、以及 v44 關於就業機會的兩性平等這三組題目，60 歲以上與 29 歲以下者接受程度相差了 30%左右；此外，這兩個年齡層在 v202 同性戀 v205 離婚這兩題的接受度平均數也相差了以 2.21 上。此外，鄰近年齡層之間的差異，尤以 60 歲以上與 50～59 歲這兩組特別明顯，在 v61 政治領導的平等、v62 大學教育的平等、以及 v63 企業主管領域的性別平等問題，50～59 歲相較 60 歲以上擁有平等性別價值者多了 13.2～24.9%，在 v202～v205 這 4 題關於同性戀、性交易、墮胎以及離婚的接受度上平均數也多了 0.42～1.24，顯示 50～59 歲這個年齡層是性別價值成長的關鍵年齡層。整體而言，年齡的分層影響了性別價值的分佈與改變。但

[8] 例如，美國女性教育與就業程度普遍高於義大利與愛爾蘭；美國女性墮胎比例高於西歐國家，在英國、愛爾蘭、比利時與德國等國對墮胎較美國嚴格；美國對於家庭與婚姻平等角色等關注遠高於西歐國家（Klein, 198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是這樣的年齡層差異如何轉化爲一個世代性的集體差異，則需要針對不同性別價值在不同時期的發展進行探討。

表 1　各年齡層的性別價值分配情形（交叉分析與 ANOVA）

年　齡　層		＞60歲	50~59歲	40~49歲	30~39歲	＜29歲	總和	卡方檢定
v57 有人說，一個小孩需要一個有父親也有母親的家庭才能快樂成長，請問你同不同意這種看法？	同意	95.9%	92.7%	87.6%	86.0%	80.8%	87.5%	χ^2=30.608 df=4 p<.001
	不同意	4.1%	7.3%	12.4%	14.0%	19.2%	12.5%	
v58 請問您同不同意婚姻是一種落伍的制度？	不同意	92.7%	93.2%	91.9%	86.8%	85.4%	89.3%	χ^2=13.816 df=4 p=.008
	同意	7.3%	6.8%	8.1%	13.2%	14.6%	10.7%	
v59 如果女性希望成為有孩子的單親媽媽，但不想有一個固定的男性伴侶，請問您贊不贊成？	不贊成	93.6%	85.9%	83.4%	73.3%	63.1%	78.1%	χ^2=77.839 df=4 p<.001
	贊成	6.4%	14.1%	16.6%	26.7%	36.9%	21.9%	
v61 請問您同不同意下列的說法：整體而言，男人比女人更適合當政治領導者	同意	59.4%	37.9%	42.0%	38.0%	40.9%	43.0%	χ^2=26.273 df=4 p<.001
	不同意	40.6%	62.1%	58.0%	62.0%	59.1%	57.0%	
v62 請問您同不同意下列的說法：大學教育對男生比對女生更重要	同意	31.1%	17.9%	10.8%	8.9%	14.3%	15.6%	χ^2=49.757 df=4 p<.001
	不同意	68.9%	82.1%	89.2%	91.1%	85.7%	84.4%	
v63 請問您同不同意下列的說法：整體而言，男人比女人更適合當企業高階主管	同意	54.7%	29.8%	32.4%	20.5%	22.9%	30.4%	χ^2=74.784 df=4 p<.001
	不同意	45.3%	70.2%	67.6%	79.5%	77.1%	69.6%	
v44 請問您同不同意下列的說法：當就業機會很少時，男人應比女人更有權利工作	同意	71.0%	63.1%	64.3%	50.0%	35.9%	54.7%	χ^2=67.750 df=4 p<.001
	不同意	29.0%	36.9%	35.7%	50.0%	64.1%	45.3%	
對於下面的行為，請問您認為它們總是有理(10)、根本沒道理(1)，或是在這兩者之間？		60歲以上	50~59歲	40~49歲	30~39歲	29歲以下	總和	檢定結果
v202 同性戀	平均數	1.82	2.86	3.29	4.25	5.51	3.81	F(4,1214)= 76.506,
v203 賣淫	平均數	2.46	2.88	2.63	3.09	3.23	2.90	F(4,1219)= 5.020, p=.001
v204 墮胎	平均數	2.79	3.89	3.54	3.61	3.75	3.55	F(4,1218)= 6.241, p<.001
v205 離婚	平均數	3.17	4.41	4.44	5.27	5.38	4.67	F(4,1216)= 27.120,

資料來源：杜素豪（2006）[9]

[9] 本文討論到性工作、賣淫、性交易等用詞時，這些相似概念的引用往往帶有不同的價值判斷，在前文討論到台灣婦運界的爭論中有提到。本文對此議題並未採取任何特定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性別價值往往是一組相關的議題或是價值的組合，世代的差異也可能是存在不同組價值之間。女性主義的價值乃是複雜，並非單一同質性的組合，因此較爲適當的方式乃是將其區分爲不同的面向，而非全部放入單一概念。爲兼顧女性主義價值在理論上的多重面向，以及在台灣發展的階段差異，同時考量既有資料中上述問題分別測量女性主義的不同價值面向，因此，本研究透過因素分析以及信度來檢驗其這些問題間是否存在共同面向以及內在一致性，以利於建構相關的概念價值指標，來檢驗性別價值的世代差異。

表 2　性別題組的因素分析與信度分析

多元家庭題目	因素分析	信度
v57 有人說，一個小孩需要一個有父親也有母親的家庭才能快樂成長，請問你同不同意這種看法？	.640	.313
v58 請問您同不同意婚姻是一種落伍的制度？	.701	
v59 如果女性希望成為有孩子的單親媽媽，但不想有一個固定的男性伴侶，請問您贊不贊成？	.473	
性別平等題目	因素分析	信度
v61 請問您同不同意下列的說法：整體而言，男人比女人更適合當政治領導者	.711	.633
v62 請問您同不同意下列的說法：大學教育對男生比對女生更重要	.727	
v63 請問您同不同意下列的說法：整體而言，男人比女人更適合當企業高階主管	.756	
v44 請問您同不同意下列的說法：當就業機會很少時，男人應比女人更有權利工作	.498	
性自主題目 對於下面的行為，請問您認為它們總是有理 (10)、根本沒道理 (1)，或是在這兩者之間？	因素分析	信度
v202 同性戀	.632	.807
v203 賣淫	.806	
v204 墮胎	.860	
v205 離婚	.794	

說明：1. 分析方式為將所有性別相關議題（11 題）經編碼轉錄為 0～1 的變數，跑因素分析。
2. 因素分析萃取方法：主成分分析。旋轉方法：含 Kaiser 常態化的 Varimax 法。

資料來源：杜素豪（2006）

價值立場，因此內文分析採取性交易此一相對中立的用詞，惟本文分析所採用的資料爲世界價值變遷，該問卷題組中的中文用詞爲賣淫，因此爲忠於原始資料，文中在引用到原始問卷題組時則是以賣淫呈現，其餘內文分析一律以性交易稱之。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將這 11 題重新編碼爲 0～1 的變數之後進行因素分析，由因素分析結果可以發現在這 11 題當中存在著三個構面，第一個構面包含了 v57、v58、v59 三題分別詢問受訪者對於雙親家庭、婚姻制度、單親母親的看法屬於同一構面，可以歸之爲多元家庭題組；第二個構面包含 v61、v62、v63、v44 四題關於政治領導、大學教育、企業主管、工作機會等面向的男女平等問題，可以歸爲性別平等題目；第三個題組則包含 v202～205 四題關於同性戀、性交易、墮胎、離婚等，可以稱之爲性解放相關議題。[10] 爲了進行指標的建構，因此本研究針對這三組題目進行內在一致性的信度分析，發現多元家庭這組題目的信度 Cronbach's α 值僅 0.313，顯示這組題目的內在一致性低，不適宜建構爲一個指標。資料所呈現的價值模組和婦運的議題發展相似，在台灣婦運的發展過程，民眾對於性別平權以及性解放自主等相關議題的討論較爲聚焦，這兩個面向也確實是台灣婦運的核心議程，至於多元家庭的議題，雖有年齡層差距但未有一致性的態度，現實上，婦運團體雖然也在討論這些問題（解構婚姻制度以及單親母親），但是社會普遍對這方面的討論仍有限。因此，本研究在後續僅針對性別平等與性解放這兩個性別價值指標進行討論，指標提供一個將議題歸類的參考，但因個別題目仍有其獨特性，因此後續分析將同時處理指標以及個別題組。

二、婦運世代的差異

要檢視婦運價值變化的軌跡，世代往往是最快捷的量尺，然而是否存在所謂婦運世代？如何切割婦運的世代是重要的課題。就定義的而言，所謂世代，一般所指經歷共同的歷史與社會變化所造成的集體性世代單位，也有的強調主觀的認同意識。究竟客觀經驗的塑造或是主觀意識兩者對於世代的界定是否同樣重要？隸屬於同一政治世代者，是否會意識到其所處時代特色的集體性，學者有不同看法，有的學者認爲如同階級意識，同一

10　這四組問題在問卷中被放置在一起，同時在受訪者的回答上，也呈現高度的一致性，故將之歸爲同一組問題，也就是性解放議題。然而這四個問題－性交易、同性戀、墮胎、以及離婚，前兩個問題確實與 90 年代台灣婦運的爭議議題高度相關，但是墮胎以及離婚則並非是 90 年代性解放的爭議性議題，故後續分析上，除了放再同一組之外，也將之個別處理。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世代成員應具有集體世代意識；不過多數學者傾向認爲，個人的意識乃非世代的必要條件，例如身處冷漠或失落的世代者，便是緣於集體意識的缺乏（Knoke, 1984；Esler, 1984）。簡言之，世代可以說是出身於同一科夥所屬的社會制度結構以及社會道德，以及歷史片段的趨勢與事件，共同創造了如同階級或族群般真實的社會世代，不論其是否具有集體意識，這樣的過程必然對該世代產生共同集體影響。

就婦運世代的劃分而言，經歷婦運先後對不同議題的社會倡議與推動，一般人的性別意識也在不同時期被動員而產生改變。若以世代來區分，本文認爲台灣的婦運發展歷程，承上文討論，可以區分爲兩個主要的階段：其一是自一九七〇改革的年代中，經歷社會結構、文化與政治改變，在此時期首次出現對於既有性別秩序的挑戰，並持續到一九八〇年代的婦運組織化的推動，以及持續的政策立法與社會結構改革，這些發展之間存在連續性，本文以該運動的時間起點，將之稱爲「婦運七〇世代」，代表在該時期中處於所謂社會化形成期（formative years）受到當時集體氛圍影響的婦運世代。其二則是在一九九〇年代，婦運出現在議題取向以及參與成員經驗間的差別，年輕婦運世代對於性解放、情慾自主、多元性取向等議題的關切，以及在大學校園的社團經驗與婦運參與的新組成，本文將之稱爲「婦運九〇世代」，指涉的是臺灣民主化後經歷多元社會變化，在此時期處於成長社會化階段，受到該時期婦女運動影響的世代。

要檢驗是否實存這樣的婦運世代差異，本文將針對一般民眾的性別態度進行世代的比較檢驗。而要具體操作世代的界線，免不了會有認定上的差異或主觀性，本文以曼海姆的社會化形成期（formative years）作爲切劃世代的基準，所謂形成期，[11] 意指著在社會重要改變的時期，處於價值觀形塑的重要階段，因產生集體價值性的改變的世代成員，一般爲個人在 18

[11] 形成期乃是影響個人價值觀點最爲關鍵的政治社會化時期。相關文獻關於形成期（formative years）的界定有各種不同的說法，且都無法避免有其任意性。有的認爲社會化的形成期主要是 10～17 歲（Sears and Valentino, 1997）；有的認爲是大學時期（Jennings, 1987）；多數則認爲是 18～25 歲（Mannheim, 1952；Schuman and Rieger, 1992；Schuman, Rieger and Guidys, 1994；Schuman and Scott, 1989）。這其中還有著跨文化的差異，上述關於形成期的文獻討論可參見於 Tessler, Konold, and Reif (2004: 19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25 歲階段。以這樣的標準來看，在一九七〇年代處於 18～25 歲者，主要是一九四五至五二年間出生者，[12] 當然其後出生者也受到同樣的影響，除非有新的世代出現，因此本文以一九四五年出生者爲「婦運七〇世代」的起點；至於一九九〇年代中處於所謂 18～25 歲者，則是一九六五至七二年間出生者，之後出生的也受到同樣價值影響，因此本文以一九六五年出生者作爲「婦運九〇世代」的起點。

有了世代的區分，進一步要討論的是，婦運世代的差異是否形成不同的性別價值取向。在資料檢驗的部份，將以不同性別價值爲因變數，以婦運世代爲主要自變數，檢視婦運世代是否是解釋性別價值差異的關鍵因素。首先，因變數的部份，參照因素分析的結果，本文將不同的性別價值先行區分爲兩群－一群是以性別平權爲主的相關題組，包含了政治領袖、大學教育、企業主管、以及工作機會的兩性平等問題；一群則是以性解放相關的議題，包含了同性戀、性交易、墮胎、離婚。具體測量上，除了各題目的檢驗之外，在性別平等與性解放指標建構的部分，性別平等的 4 個問題經轉錄後，分數越高則越具性別平等的態度，將 4 題相加，最低分爲 0，最高分爲 4；性解放的部分，同樣爲各題越具性解放價值的分數越高，將 4 題相加後再轉錄爲最低分爲 1，最高分爲 10 的性解放指標。

自變數的部份，則是以婦運「婦運七〇世代」以及「婦運九〇世代」爲主要解釋變項，分別將原本的年齡層合併，以一九四五至一九六四爲「婦運七〇世代」，一九六五以後爲「婦運九〇世代」，並以一九四四年以前出生者作爲婦運前世代。此外，世代往往與生命週期的影響相關，個人在不同生命週期中往往會有不同的其他條件，例如社會經濟地位等相關條件，影響了個人的態度或價值，這些條件必須控制以區別世代的效果究竟是真實或是虛假的。例如，越年長者往往教育程度較年輕人爲低，中年時期的個人收入或是社會地位往往是最高的。因此，若要釐清個人所處的世代或是生命週期的影響，必須控制因爲其他社會經濟地位因素所造成的差異。生命週期的解釋強調個人在生命不同階段，所面臨的社會位置以及私

[12] 以 1970 減去 18～25 得到 1945～52 出生年，同樣以 1990 減去 18～25 得到 1965～72 出生年。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領域情境等因素的影響，也會影響個人的性別意識，因此必須加以控制。在社會結構的部份，本文控制受訪者的教育程度，進而比較在同等社會結構類別下性別意識的差異。在情境因素的部份，本文控制受訪者的婚姻狀態、是否就業、是否有小孩，進而比較在同樣的私領域情境下，性別意識的差別。

表 3 爲性別平權的題組，因變數共有四個，一爲性別平權綜合性指標、另外三個子題目則是關於政治領導、大學教育、企業主管、以及工作機會的男女平等同意與否，變數測量值（scale）皆爲 0/1，因此跑洛基迴歸（logistic model），詳細操作請見附錄。爲比較不同婦運世代的價值之別，主要自變數以婦運七〇世代爲底，比較和婦運前世代以及婦運九〇世代的差異。由模型結果可以發現，在控制其他條件的情況下，世代的影響力對於性別平權綜合指標、v61 政治領導、v62 大學教育、以及 v63 企業主管的性別平等皆屬一致：相較於七〇世代，婦運前世代者明顯地有較低的性別平權價值，而九〇與七〇年代則無顯著的差異；但在 v44 工作權平等觀念的部分，相較於七〇世代，無論是婦運前世代或是九〇世代，皆無顯著的影響。此外，影響性別平權的因素還有教育程度，整體而言，中高教育程度者相較於低教育程度者，性別平權價值較高，但教育的影響力並未顯現在 v61 政治領導者觀念的部分，意謂著教育程度高低並不影響對男女政治平權的態度。

雖然說在性別平權指標與各題組間略有差異，但差異並不明顯，原則上都受到世代與教育程度的影響，而平權價值的世代差異主要是表現在婦運七〇世代以及婦運前世代之間。七〇年代是台灣社會現代化的關鍵時代，也是台灣提倡新女性主義的起點，不論是從文化或是法律層面，在教育、工作乃至於政治各面向提倡性別平等，在當時已經產生劃時代的影響。資料也顯示，婦運七〇世代確實是性別平權價值出現根本態度差異的分水嶺世代。

表 4 爲性解放的題組，因變數有四個，一爲性解放總和指標、以及三個子題關於同性戀、性交易、墮胎、以及離婚的接受度，變數測量值（scale）皆爲 1～10，因此以迴歸模型（OLS regression model）進行分析，詳細數據請見附錄。模型結果顯示，影響性解放指標與各子題的因素不若性別平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表 3　性別平權題組迴歸以及洛基迴歸分析

	性別平權綜合指標（0～4）		v61 整體而言，男人比女人更適合當政治領導者（1 不同意／0 同意）		v62 大學教育對男生比對女生更重要（1 不同意／0 同意）		v63 整體而言，男人比女人更適合當企業高階主管（1 不同意／0 同意）		v44 當就業機會很少時，男人應比女人更有權利工作（1 不同意／0 同意)	
	B	(S.E.)	B	(S.E.)	B	(S.E.)	B	(S.E.)	B	(S.E.)
（常數）	2.50	(0.21)***	0.75	(0.34)*	1.01	(0.46)*	1.08	(0.39)**	-0.92	(0.38)*
婦運世代（婦運七〇世代）										
婦運前世代（～1944）	-0.67	(0.13)***	-0.94	(0.20)***	-0.75	(0.24)**	-1.00	(0.21)***	-0.14	(0.24)
婦運九〇世代（1965～）	-0.06	(0.10)	-0.25	(0.16)	0.08	(0.24)	-0.06	(0.18)	0.10	(0.19)
性別：女性	0.15	(0.08)	0.10	(0.12)	0.30	(0.17)	0.21	(0.14)	0.24	(0.15)
教育（高中職以下）										
高教育（大專及以上）	0.70	(0.11)***	0.13	(0.17)	0.98	(0.26)***	0.92	(0.19)***	1.60	(0.20)***
中教育（高中職）	0.31	(0.10)**	0.13	(0.16)	0.33	(0.22)	0.46	(0.17)**	0.66	(0.19)***
已就業／無就業	0.00	(0.09)	-0.11	(0.15)	0.26	(0.19)	-0.14	(0.16)	-0.06	(0.17)
有小孩／無小孩	-0.26	(0.18)	-0.31	(0.30)	0.25	(0.42)	-0.51	(0.35)	-0.23	(0.33)
單身／已婚	-0.09	(0.19)	-0.15	(0.30)	-0.16	(0.42)	-0.37	(0.35)	0.25	(0.34)
模型資訊	樣本數=970 Adj.R^2=.130 S.E.E.=1.177 p<.001		樣本數=1219 LR χ^2=32.713 df=8, p<.001 Nagelkerke Pseudo-R^2=.036		樣本數=1224 LR χ^2=58.183 d.f=8 , p<.001 Nagelkerke Pseudo-R^2=.080		樣本數=1223 LR χ^2=95.370 d.f=8, p<.001 Nagelkerke Pseudo-R^2=.106		樣本數=973 LR χ^2=144.045 d.f=8, p<.001 Nagelkerke Pseudo-R^2=.184	

說　　明：1. ***p<0.001; **p<0.01; *p<0.05（雙尾檢定）。

2. 因依變數的性質，性別平權指標為 Regression Model，其他四個為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

資料來源：杜素豪（200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表 4　性解放題組迴歸分析

	性解放指標（1～10）		v202 同性戀（1～10）		v203 賣淫（1～10）		v204 墮胎（1～10）		v205 離婚（1～10）	
	B	(S.E.)	B	(S.E.)	B	(S.E.)	B	(S.E.)	B	(S.E.)
（常數）	3.78	(0.35)***	3.75	(0.40)***	3.07	(0.37)***	3.31	(0.39)***	4.18	(0.41)***
婦運世代（婦運七〇世代）										
婦運前世代（～1944）	-0.58	(0.21)**	-0.86	(0.24)***	-0.26	(0.22)	-0.77	(0.24)**	-0.88	(0.25)***
婦運九〇世代（1965～）	0.11	(0.17)	0.58	(0.20)**	0.40	(0.18)*	-0.19	(0.19)	0.33	(0.20)
性別：女性	0.09	(0.13)	0.58	(0.15)***	-0.38	(0.13)**	-0.07	(0.14)	0.35	(0.15)*
教育										
高教育（大專及以上）	1.07	(0.18)***	1.89	(0.21)***	-0.08	(0.19)	0.79	(0.20)***	1.38	(0.21)***
中教育（高中職）	0.54	(0.17) **	0.89	(0.20)***	-0.06	(0.18)	0.17	(0.19)	0.62	(0.20)**
已就業／無就業	-0.05	(0.15)	-0.13	(0.17)	-0.12	(0.16)	-0.19	(0.17)	-0.16	(0.18)
有小孩／無小孩	-0.71	(0.30)*	-1.56	(0.35)***	-0.06	(0.32)	0.33	(0.34)	-0.32	(0.36)
單身／已婚	-0.21	(0.30)	-0.40	(0.35)	0.10	(0.33)	0.28	(0.35)	-0.06	(0.37)
模型資訊	樣本數=1217 Adj.R^2=.117 S.E.E.=1.931 *p*<.001		樣本數=1219 Adj.R^2=.262 S.E.E.=2.452 *p*<.001		樣本數=1219 Adj.R^2=.014 S.E.E.=2.261 *p*=.002		樣本數=1224 Adj.R^2=.023 S.E.E.=2.391 *p*<.001		樣本數=1223 Adj.R^2=.106 S.E.E.=2.533 *p*<.001	

說　　明：****p*<0.001; ***p*<0.01; **p*<0.05（雙尾檢定）。

資料來源：杜素豪（200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權指標與題組間一致。由此統計結果我們可以發現，控制其他條件下，世代對於性解放指標、v202 同性戀、v204 墮胎、以及 v205 離婚等議題有一致的影響，婦運前世代與七〇世代之間存在顯著差異，婦運前世代較七〇世代傾向不支持同性戀、墮胎、離婚等議題，但在性交易的議題上婦運前與七〇世代則無顯著的差異。與性別平權題組不同的是，七〇世代與九〇世代在性解放各題組間的差異較爲明顯，九〇世代較七〇世代更加傾向支持同性戀議題，也更支持性交易的議題，但在墮胎與離婚議題則沒有態度上的差別。也就是，在性解放相關議題上，特別是在同性戀以及性交易的議題上，除了在婦運前世代與七〇世代之間存在差異之外，在七〇世代與九〇世代之間也存在差異。性解放的議題在不同世代間（婦運前 vs. 七〇世代/七〇世代 vs. 九〇世代）呈顯出明顯的立場差異，越年輕的世代支持立場更爲清楚。這樣的發展也顯示出，台灣在九〇年代社會越趨多元，價值取向也逐漸產生轉變，在性別價值的轉變上，對性取向以及性交易的支持態度，反映了不同婦運世代的經驗以及態度差異。

除了世代間的差異之外，其他情境與結構因素的影響力，在各議題間的差異也相對於性別平權題組來得大。性別僅在同性戀、性交易、離婚議題上有顯著的影響，女性相較於男性傾向於支持同性戀與離婚，但較不傾向支持性交易。教育程度則如同世代影響一般，僅在性交易議題上無影響，其他皆有顯著的正向作用，教育程度越高者越接受性解放相關議題。個人私領域處境有無小孩僅影響對於同性戀議題的看法與性解放指標，有小孩相對於無小孩者，對於同性戀議題及性解放價值較持負面的看法。

上述討論分別就影響不同性別議題態度的因素進行整體性的探討，顯示影響性別價值因素眾多，性別、教育程度以及家庭情境等因素對不同性別議題產生影響，而唯一對所有性別議題有著普遍性影響的因素則是世代，顯示世代在解釋性別價值的重要性。然而不同世代間的差異，乃是反映在不同議題之上，因此，根據上述模型結果，本研究進一步將婦運前世代與婦運七〇世代，以及婦運七〇與九〇世代之間存在著顯著的議題將以區分。表 5 顯示，在控制其他相關因素之後，婦運前世代與婦運七〇世代之間存在顯著價值差異的議題，包含政治領導、大學教育、企業主管等面向的性別平權態度，以及對於同性戀、墮胎、以及離婚的態度等，都存在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世代差異。至於婦運七〇與九〇世代之間存在顯著態度差異的議題，則是在九〇年代引發婦女團體內爆的性交易以及同性戀議題。顯示身處相同婦運世代，經歷婦運推動議題的變化與分歧，一般民眾也產生了集體的性別價值意識的改變。

表 5　比較婦運前世代、七〇世代、九〇世代之間的議題差異

	性　別　平　權	性　　解　　放
婦運前與七〇世代有差異價值	政治領導　兩性平等（v61） 大學教育　兩性平等（v62） 企業主管　兩性平等（v63）	同性戀（v202） 墮　胎（v204） 離　婚（v205）
七〇世代與九〇世代有差異的價值		同性戀（v202） 性交易（v203）
世代間沒有差異	工作機會　兩性平等（v44）	

資料來源：本研究製表

伍、結論

在台灣婦運發展的過程中，婦運內部在議題與價值的差異甚至對立，究竟只是婦運圈內少數人的茶壺裡的風暴；或者反映的是，已然改變的集體世代成員的更替以及性別價值變遷的軌跡。本研究結果顯示，民眾的性別價值的改變似乎正反映出婦運推動議題的多元化，這個改變是以世代爲單位的集體性改變，生長於不同婦運時期的世代成員，經歷社會氛圍的改變以及不同的性別議題的推動，在性別意識與價值上也有所不同。

不同世代在性別價值的差異主要表現於：在婦運發展初期七〇年代所強調的平權價值，包括在政治、教育、企業等面向的男女平權議題，以及社會開始注意到同性戀、墮胎、以及在離婚等議題，當時的年輕世代（本文的七〇世代）產生集體性價值的呼應，婦運七〇世代與婦運前世代在性別平權價值以及在性解放等相關議題上都存在明顯的差異，顯示七〇年代確實是台灣社會文化轉變的重要分水嶺。而隨著婦運的推動，在各種社會場域中，性別平權逐漸成爲社會普遍接受的價值，也在法制和體制層次逐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步獲得落實，顯示在婦運七〇世代與婦運九〇世代這兩個婦運世代，在性別平權的價值上有著相當高的一致性與延續性，這兩個婦運世代的差異，則是出現在性解放議題上。

在九〇年代，隨著社會變遷以及世代成員的更替，性別議題的多元化發展，新世代對於性解放相關的議題與七〇年代世代已經有所差異，兩個世代主要的差異顯示在同性戀以及性交易的面向，也反映了當時婦運的立場爭議。值得注意的是，本研究所處理的性解放議題，包括性交易、同志、離婚和墮胎議題，這些議題都牽涉身體和性政治的關係，在理論上存在著相關性，在資料信度分析上也屬於同一組問題，但統計迴歸因果分析的結果卻顯示，在婦運七〇世代與婦運九〇世代間，只有在同性戀和性交易問題出現差異，在離婚和墮胎的問題上則無差異。這樣的結果，如果我們拉回九〇年代的歷史脈絡以及當時婦運界所出現的爭議，或許可以獲得部份解釋，在九〇年代性別研究進入大專院校，年輕世代開始注意到性認同的政治議題，性交易問題更是導致婦運出現不同立場的主要爭議（公娼性剝削與性工作權），與此同時，離婚和墮胎在台灣的在地婦運經驗中，則未出現運動的內在爭議或是同等的社會關注。或者可以說，在婦運前世代和婦運七〇世代之間，一般民眾存在著有無性別價值的差異，而在婦運七〇世代和婦運九〇世代之間，一般民眾的性別價值的差異呼應著婦運內部出現的世代差異。

此外，本文雖強調世代間的差異，但並非否認存在著世代內的差異，也並非要以世代集體簡化個體間的差異。以世代作爲區分，主要是要呈顯一個世代間的相對價值差異的變化趨勢，但本文也認爲，即使是身於同一世代者，不必然擁有相同的態度。個人的社會位置如教育以及生命情境因素也都影響了個人的性別價值的差異。這些個別變項所造成個人態度的差異，也顯示出即使是存在相同世代經驗的情況下（as given），個人仍會因爲具體社會位置與生命情境的差異，而具有不同的性別價值。整體來看，教育程度較高者，較具有平權價值，而有小孩相對於無小孩者，對於同性戀議題及性解放價值較持負面的看法，此發現也反映出傳統異性戀家庭價值觀和多元家庭同志伴侶關係之間的緊張。

另外，相對於既有研究強調性別對個人性別價值取向的影響，本研究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則顯示，世代相對於個人的生理或社會性別，對於其性別態度有著更爲一致的影響。同一個世代不論男女往往分享著共同的性別平權價值，而男女在性解放議題上的差異，主要顯示在女性相較於男性傾向於支持同性戀與離婚，但比較不傾向支持性交易。這樣的態度，或許和女性的社會位置有關，女性在親密關係和婚姻中的相對弱勢以及在性交易中可能存在的被剝削問題，使得女性相較於男性更支持同性戀以及離婚，而較不支持性交易。

本研究嘗試將台灣婦運進行時間世代的劃分，並提出「婦運七〇世代」以及「婦運九〇世代」的差別，透過這樣的劃分方式，希望可以協助理解台灣婦運發展的歷史脈絡軌跡。世代研究有各種不同的分析方式，有的從歷史敘事入手，在綿密的歷史事件論證中，尋找世代的軌跡，琢磨出世代的形貌並充實所謂世代的意涵。本研究一方面以既有文獻的討論來捕捉台灣婦運的時間象限，並以成員組成的更替以及議題的差異來區分，提出所謂「婦運七〇世代」以及「婦運九〇世代」，並點出世代差異除了成員的更替之外，主要是在性別價值上的改變。另一方面，也從資料的分析檢證這樣的劃分是否合宜，能夠反映不同婦運世代的價值差異。這樣的作法，可以說是既從文獻理論的演繹出發，同時反向以資料的歸納來驗證婦運世代與價值之別。

當然本研究也面對一些限制。關於世代的切劃，世代的界線與長度的劃分上往往具有任意性（arbitrary）。本文作爲一個初步的嘗試，希望能從研究目的出發，透過文獻以及實際問卷資料不同角度來相互驗證，這樣的做法可以盡量避免世代切劃的主觀性，但是時間的切劃不可避免地會有過於絕對的問題（例如前後一年之別），但這是世代研究無法迴避的困境（如同階級的認定定義分歧），或許也正是世代作爲分析工具本身的預設。再者，關於世代與其他時間面向的關係，如何進一步確認，這些世代觀點將會隨著時間而持續，在目前缺乏時間縱斷性資料的限制下，僅能以控制變項來加以處理，此外，受限於單一年度的橫切面資料，暫時難以呈現台灣婦女在性別平權與性解放等性別價值的長期穩定傾向。也希望在未來有更多長期性資料時，可以持續觀察性別價值的演變。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參考書目

一、中文部分

卡維波，2001，〈「婦權派」與「性權派」的兩條女性主義路線在台灣－爲「亞洲連結會議」介紹性〉，《文化研究月報》網頁，http://www.ncu.edu.tw/~eng/csaljournal-forum_52.htm，2011/09/26。

杜素豪，2006，《世界價值觀調查推動計畫》，台北：行政院國科會委託（NSC 95-2420-H-001-005）。

林芳玫，1998，〈當代台灣婦運的認同政治：以公娼存廢爭議爲例〉，《中外文學》，27(1): 56-87。

范　雲，2003，〈政治轉型中的婦女運動：以運動者及其生命傳記背景爲核心的分析取向〉，《台灣社會學》，5: 133-194。

張晉芬，1995，〈綿綿此恨，可有絕期？女性工作困境之剖析〉，劉毓秀（主編），《台灣婦女處境白皮書：1995 年》，台北：時報文化，頁 147-180。

張晉芬、林芳玫，1999，〈性別〉，王振寰、瞿海源（主編），《社會學與台灣社會》，台北：巨流，頁 199-238。

梁雙蓮、顧燕翎，1995，〈台灣婦女的政治參與－體制內與體制外的觀察〉，劉毓秀（主編），《台灣婦女處境白皮書：1995 年》，台北：時報文化，頁 93-143。

陳陸輝，2000，〈台灣選民政黨認同的持續與變遷〉，《選舉研究》，7(2): 109-141。

彭渰雯，2006，〈邁向後現代婦運：以打破娼妓制度之二元式爭辯爲例〉，《世新大學人文社會學報》，7: 63-84。

彭渰雯，2008，〈當官僚遇上婦運：台灣推動性別主流化的經驗初探〉，《東吳政治學報》，26(4): 1-58。

黃淑玲，2008，〈性別主流化－國際與在地經驗的對話〉，《研考雙月刊》，26: 3-12。

劉義周，1993，〈臺灣的政治世代〉，《政治學報》，21: 99-12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劉義周，1994，〈臺灣選民政黨形象的世代差異〉，《選舉研究》，1(1): 53-73。

蕭阿勤，2005，〈世代認同與歷史敘事：台灣一九七〇年代「回歸現實」世代的形成〉，《台灣社會學》，9: 1-58。

謝小芩，1995，〈教育：從父權的複製到女性的解放〉，劉毓秀（主編），《台灣婦女處境白皮書：1995 年》，台北：時報文化，頁 183-218。

顧燕翎，1997，〈台灣婦運組織中性慾政治之轉變：受害客體抑或情慾主體〉，《思與言》，35(1): 87-118。

二、英文部分

Abramson, Paul R. 1983. *Political Attitudes in American: Formation and Change*. San Francisco: WH Freeman and Company Press.

Andersen, Kristi and Elizabeth A. Cook. 1985. "Women, Work and Political Attitude."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29(3): 606-625.

Armstrong, Elisabeth. 2002. *The Retreat from Organizations: U. S. Feminism Reconceptualized*. Albany, 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Banaszak, Lee Ann and Eric Plutzer 1993. "Contextual Determinants of Feminist Attitudes:National and Subnational Influences in Western Europe."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7 (1): 147-157.

Braungart, Margaret M. 1984. "Aging and Politics." *Journal of Politics and Military Sociology* 12 (Spring): 79-98.

Braungart, Richard G. and Margaret M. Braungart. 1984. "Generational Politics." *Micropolitics* 3: 349-415.

Campbell, Angus 1971. "Politics Through the Life Cycle." *The Gerontologist* 11: 112-117.

Esler, Anthony 1984. "The Truest Community: Social Generations as Collective Mentalities." *Journal of Political and Military Sociology* 12: 99-112.

Farganis, Sondra. 1994. *Situating Feminism: From Thought to Action*.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Thousand Oaks, CA: Sage Publications.

Ferree, Myra M. and Beth B. Hess. 1985. *Controversy and Coalition: The New Feminist Movement*. Boston: G. K. Hall.

Ferree, Myra M. and Beth B. Hess. 2000. *Controversy and Coalition: The New Feminist Movement across Four Decades of Change.* NY: Routledge.

Ginsburg, Faye. 1989. *Contested Lives: The Abortion Debate in an American Community*.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Jennings, Kent M. 1987. "Residues of a Movement: The Aging of the American Protest Generatio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1: 368-82.

Klein, Ethel. 1987. "The Diffusion of Consciousnes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Western European." In *The Women's Movements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Western Europe*, eds. Mary Katzenstein and Carol Mueller.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Knoke, David. 1984. "Conceptual and Measurement aspects in the Study of Political Generations." *Journal of Political and Military Sociology* 12: 191-201.

Lovenduski, Joni. 1986. *Women and European Politics: Contemporary Feminism and Public Policy*. Brighton, Sussex: Wheatsheaf Books.

Mannheim, Karl. 1952. "The Problems of Generations." In *Essays on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ed. Paul Kecskemeti.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76-320.

Milbrath, Lester, and M. L. Goel. 1977.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How and Why do People Get Involved in Politics?* Chicago: Rand McNally.

Misciagno, Patricia S. 1997. *Rethinking Feminist Identification: The Case for De Facto Feminism.* Westport, CT: Preager.

Pearsall, Marilyn. 1999. *Women and Values: Readings in Recent Feminist Philosophy.* Belmont, Calif: Wadsworth.

Randall, Vicky. 1987. *Women and Politics.* London: The Macmillan Press.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Rossi, Alice S. 1982. *Feminists in Politics.* NY: Academic Press.

Schneider, Beth. 1988. “Political Generations in the Contemporary Women’s Movement. ” *Sociological Inquiry* 58: 4-21.

Schnittker, Jason, Jeremy Freese and Brian Powell. 2003. “Who Are Feminists and What Do They Believe? The Role of Generation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8(4): 607-622.

Schuman, Howard and Jacqueline Scott. 1898. “Generations and Collective memorie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4(3): 351-381.

Schuman, Howard, Cheryl Rieger and Vl Guidys. 1994. “Generation and Collective Memories in Lithuania.” In *Autobiographical Memory and the Validity of Retrospective Reports*, eds. N. Schwarz and S. Sudman, New York, 313-333.

Sears, David O. and A. Valention. 1997. “Politics natters: Political Events as Catalysts for Predult Socializatio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91: 45-65.

Steinem, Gloria. 1983. *Outrageous Acts and Everyday Rebellions.* NY: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Tessler, Mark, Carrie Konold and Megan Reif. 2004. “Political Generations in Develping Countries.” *Public Opinion Quartely* 68(2): 184-216.

Verba, Sidney and Norman H. Nie. 1972. *Participation in America: Political Democracy and Social Equality.* NY: Harper and Row.

Wilcox, Clyde. 1991. “The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Feminist Consciousness Among Western European Women.”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23: 519-4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附錄　變項的測量與處理方式

本文使用的資料主要係採自「世界價值變遷」（WVSs）第五波台灣區資料（NSC 95-2420-H-001-005），計畫主持人爲杜素豪，由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暨調查研究專題中心於 2006 年執行，訪問對象爲台灣地區 18～85 歲非機構型的一般民眾，成功樣本數爲 1227。

測　量　題　目	變　項	處　理　方　式
	性　別	分為兩類： 1. 男性 2. 女性
v57 有人說，一個小孩需要一個有父親也有母親的家庭才能快樂成長，請問你同不同意這種看法？		0. 同意 1. 不同意
v58 請問您同不同意婚姻是一種落伍的制度？		0. 不同意 1. 同意
v59 如果女性希望成為有孩子的單親媽媽，但不想有一個固定的男性伴侶，請問您贊不贊成？		0. 不贊成 1. 贊成
v61 請問您同不同意下列的說法：整體而言，男人比女人更適合當政治領導者	性別平等 將這 4 題相加，建構為 0～4 尺度的指標性別平等	0. 同意 1. 不同意
v62 請問您同不同意下列的說法：大學教育對男生比對女生更重要		0. 同意 1. 不同意
v63 請問您同不同意下列的說法：整體而言，男人比女人更適合當企業高階主管		0. 同意 1. 不同意
v44 請問您同不同意下列的說法：當就業機會很少時，男人應比女人更有權利工作		0. 同意 1. 不同意
對於下面的行為，請問您認為它們總是有理(10)、根本沒道理 (1)，或是在這兩者之間？v202 同性戀	性解放 將這 4 題相加後除以 4，建構為 1～10 尺度的指標	在因素分析時轉錄為 0～1 的尺度 在建構指標時，則取原先各自編碼為 1～10
對於下面的行為，請問您認為它們總是有理(10)、根本沒道理 (1)，或是在這兩者之間？v203 賣淫		在因素分析時轉錄為 0～1 的尺度 在建構指標時，則取原先各自編碼為 1～10
對於下面的行為，請問您認為它們總是有理(10)、根本沒道理 (1)，或是在這兩者之間？v204 墮胎		在因素分析時轉錄為 0～1 的尺度 在建構指標時，則取原先各自編碼為 1～10
對於下面的行為，請問您認為它們總是有理(10)、根本沒道理 (1)，或是在這兩者之間？v205 離婚		在因素分析時轉錄為 0～1 的尺度 在建構指標時，則取原先各自編碼為 1～1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測　量　題　目	變　項	處　理　方　式
V236 請問您是什麼時候出生的？	年齡層	分為五類： 1. 60 歲以上：1945 以前出生 2. 50～59 歲：1946～1955 年 3. 40～49 歲：1956～1965 年 4. 30～39 歲：1966～1975 年 5. 29 歲以下：1976 以後出生
V236 請問您是什麼時候出生的？	世　代	分為三類： 1. 婦運前世代：1944 以前出生 2. 七〇世代：1945～1964 年出生 3. 九〇世代：1965 以後出生
V235 受訪者性別	性　別	分為兩類： 0. 男性 1. 女性
V238 請問您的最高學歷（教育程度）是？	教育程度	分為三類： 1. 低教育程度：國中小及以下 2. 中教育程度：高中職 3. 高教育程度：大學專科及以上
V241 請問您現在是否有工作？	職　業	分為兩類： 1. 有就業（包含全職、兼職、自己開業） 2. 無就業（包含退休、家庭主婦且無任何工作、學生且無任何工作、失業）
V56 請問您有過幾個小孩？	家　庭	分為兩類： 1. 有小孩（包含 1 個及以上） 2. 無小孩
V55 請問您目前的婚姻狀況是已婚、同居、離婚、分居、喪偶，還是單身（從未結過婚）？	婚　姻	分為兩類： 1. 有婚姻經驗（包含已婚、同居、離婚、分居、喪偶） 2. 未婚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The Women's Movement and Value Differences across Generations in Taiwan

*Wan-ying Yang**

Abstract

This study concerns the connection between public gender consciousnes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women's movement. Women's movements have advocated different gender issues and values in different time periods, which then diffuse into and mobilize the gender consciousness of the general public. Following the progress of the Taiwan women's movement, changes in the gender values of the general public can be divided into two stages or generations. The first gender generation refers to those who, experiencing social, cultural, and political change began to challenge the established gender order and form new organizations which advocated for policy reform and changes in the social structure. This study labels this movement as the "1970s generation women's movement," referring to the generation whose gender values are shaped by the collective women's movement ofthe time. The second gender generation arising in the 1990s following Taiwan democratization and increased social plurality instilled women's issues into the university curriculums and campus activities and associations. With the appearance of new members who had grown up in a relatively gender-equal environment, the focus of the movement turned to the subject of identity and difference. We refer those whose gender values were shaped during this period as "1990s generation women's movement." To further examine the collective generational differences in terms of gender values, this study applied the World Value Surveys for Taiwan in 2006. The empirical test shows that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generation before the emergence of the women's movement generation and the 1970s generation women's movementare manifested in the gender equality values across a range of

*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E-mail: wyyang@nccu.edu.tw.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spheres, including education, employment, and political leadership. It also found that the main attitudinal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generations of the 1970s and 1990s are related to issues of sexual liberalization, particularly in terms of attitudes toward homosexuality and prostitution. In conclusion, this study shows that generational units are central to understanding the collective transformation of Taiwan's gender values.

Keywords: Women's Movement, Generation, 1970s Generation Women's Movement, 1990s Generation Women's Movement, World Values Surveys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